



清代文化 名人传略

——下
廖晓晴等◎著

清代文化名人传略

（下）

廖晓晴等◎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文化名人传略/廖晓晴等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5. 4
(2017. 6 重印)

ISBN 978 - 7 - 5451 - 3386 - 8

I. ①清… II. ①廖… III. ①文化—名人一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6861 号

清代文化名人传略 (上下)

责任编辑 柳海松

责任校对 郭建荣

开 本 690mm × 960mm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35. 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辽海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 - 7 - 5451 - 3386 - 8 定价: 89.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方 苞

一、生平事迹

方苞（1668～1749），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安徽省安庆府桐城县人，祖居在今安徽省桐城市区凤仪里附近，生于江宁府。清代散文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

方苞自幼聪明，4岁能作对联，5岁能背诵经文章句，但家境贫寒的他，童年时代便深切体验到了生活的“辛苦忧患”。方苞之父是一位不善治家的文人，“先君子中岁尤穷空，母生苞兄弟及女兄弟凡六人，一婢老不任事，缝纫、洒扫、炊汲，皆身任之。方冬时，仅敝絮一套，有覆而无荐。旬月中，不再食者屡也。”^①

康熙三十四年（1695），方苞为衣食之谋，坐馆河北琢州滕氏，曾险些病死他乡，此时的方苞“疲疴叠婴，筋骨脆危”，

^① 方苞：《方苞集》，第493—4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乞食白活，窘若佣隶。”^①

方苞分别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十二年（1693）、三十五年（1696）、三十八年（1699）四应乡试，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十二年（1703）、四十五年（1706）三应会试。他三应乡试而不第后，心灰意冷，曾决意“不复应有司之举”。他第四次应江南乡试，而举第一。但接着又两应会试而落榜。第三次应礼部试时，方苞已39岁，此次获进士第四名，仕进在望。在即将参加殿试时，方苞忽闻母疾剧，遂归江南，直至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发，方苞未曾仕进，其间又历五载。

自明清以来，科举举仕的弊端越来越突出，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有力的抨击，方苞也曾多次批评那些汲汲于仕进的利禄之徒，他在《学案序》中说：“自功利辞章之习成，学者之身荡然而无所守也久矣。”^②

方苞一方面认为一意科举之道是“人心蔽陷”之途，不屑与利禄之徒为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稻粱之谋，企图通过仕进以改变生活的困顿和地位的低微，

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方氏族人归于旗籍。方苞经受了人生最严酷的生与死的考验，方苞对本人临难中的惊恐万状、深悲巨痛，家室和亲友在厄运中的艰危流离、家破人亡等，方苞有《狱中杂记》、《结感录》二文，是专门记叙其坐狱及临难时人事情形的。

《狱中杂记》对刑部狱惨无人道的恶劣环境作了具体描写，

① 方苞：《方苞集》，493—4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 《方苞集》，第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对狱吏的嗜血成性、贪婪残暴给予真切的揭露。

方苞作为囚犯所遭受之非人待遇，身心所受之摧残，所蒙受之奇耻大辱，应当是令人震颤、刻骨铭心的。但性格内敛，护惜声名、谙于文辞的方苞只记狱中之情形而不写狱中之本人，只写狱中之人事而不及个人之感受，这正说明方苞压抑着内心巨大的耻辱、痛苦，掩盖着内心尖锐的矛盾。

从《结感录》中我们也能看到，方被逮后便被抄家，母亲、妻儿无着，“狱隶前加锁，迫扼喉间”，“狱中地狭，自春至秋，疫厉作，死者相望，秽气郁蒸，虽仆隶不可耐。”^①

《南山集》案发之前方苞已有文名，加之李光地等人的周旋救助，多次向康熙帝说情，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皇帝殊谕：“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② 故免方氏之罪，且诏命方苞以白衣入值南书房，由此方苞开始了30年的仕官生涯。他身仕康、雍、乾三朝，前十年作康熙帝的文学侍从；中十年充武英殿《四库全书》修书总裁，后接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后十年任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于75岁时告老还乡。在30年的仕官生涯中，方苞未经受重大波折，称得上通达。“恩慈备加，至优至渥。”^③ 方苞对三朝皇帝是感念于心的。作为文臣，方苞勤勉尽职，作了自己应做之事，也受到皇帝肯定和褒扬。

但方苞的为官生涯并不轻松，他以“罪臣”而入朝为官，无法摆脱沉重的精神负担。例如方苞供职蒙养斋时，与时任阁臣的李光地和以总宪兼院长的徐元梦过从甚多，李、徐认为方苞于

^① 《方苞集》，第7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 《方苞集》，第5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③ 《方苞集》，第5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政事颇有见解，欲荐方苞，方氏便推辞说：“仆本罪臣，不死已为非望，公休矣！”^①

乾隆四年（1739），方苞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1742），75岁的方苞乞解书局，告老还乡，结束了他30年的仕官生涯。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1749）病逝，享年82岁，葬于江苏省六合县。

二、文学成就

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为人刚直，好当面斥责人之过错，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挤。

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在《史记评语》里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他提出文章要重“清真雅正”和“雅洁”，倡“道”、“文”统一。反对黄宗羲、颜元的反程朱理学的思想，持论严而拘，但能适合清朝巩固思想统治及文风的需要，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于公务之暇，方苞勤于撰经学著作，研究《三礼》、《春秋》

① 方苞：《方望溪遗集》，黄山书社，1990年。

等，著有《周官集注》十三卷、《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疑》四卷、《周官辩》一卷、《仪礼析疑》十七卷、《礼记析疑》四十六卷、《丧礼或问》一卷、《春秋比事目录》四卷、《诗义补正》八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一卷、《奏议》二卷、《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补遗》十四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所撰名篇有：《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另著有《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集外文补遗》二卷。

方苞有些作品，如《狱中杂记》，反映了封建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的残酷与黑暗。《送冯文子序》、《送吴平一舅氏之钜鹿序》、《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请备荒政兼修地治》，反映了一些州县吏治黑幕及民生疾苦，较有现实意义。

作为皇帝要政大典之礼仪顾问，方苞是一位言每称孔孟程朱，行多讲典制礼法的儒臣、道学先生，每从儒家经典中寻找根据，追践旧制古礼。乾隆初年，方苞曾上呈现皇帝札子，要求朝廷官员按照古制实行三年之丧，要求皇帝下诏让孔庙中礼祀孔子前母施氏，显示出他思想的落后与保守。

方苞致力于儒学经书，不读释氏著作，与方苞对释氏的排斥态度相比较，对庄子著作则作过认真研读，且悟其大意。据近人刘声木考，方苞曾著有《评点庄子》若干卷^①。

方苞仕官京城，作为皇帝近臣，为公务所忙，为人事所役，三十年内少有机会自由地游览山水名胜，当然也少有林泉之思。

^① 刘声木：《城文学撰述考》，第397页，黄山书社，1989年。

但一旦有暇，他还是愿意亲近自然山水。康熙五十七年（1718），方苞在内廷蒙养斋任职，初夏之时曾有京西潭拓寺之游。在《游潭拓记》中他又一次提起庄子“昔庄周自述所学，请与天地精神往来。余困于尘劳，忽睹兹山之与吾神者善也，殆恍然如周所云者。”^①

乾隆七年（1742），方苞以疾辞官还乡。经历了30年的为官生涯，75岁的方苞虽然衰疾在身，却有“无官一身轻”之感，这是一种空前的解脱。他稍作调理，于次年秋便有浙东之行。此次出游一是为寻医，再是为游览山水。方苞在其甥陪同之下游览了天姥、雁荡诸山。他在《游雁荡记》中说：“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游者欣然而乐。而兹山岩深壁峭，仰而观、俯而视者，严恭静正之心不觉其自动。盖至此则万感绝，百虑冥，而吾之本心乃与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②

方苞之著述不涉美学思想，但他这种真切感悟，这种在自然山水面前暂时摆脱尘世烦扰而达到精神与自然的融合会通，正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庄之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③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并以此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方苞是理解和赞同的。

儒道互补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一个特点。方苞以儒立身，同时也需要道家思想的慰藉，由此见出方苞思想在儒道选择方面的矛盾。当然方苞毕竟以儒立身，孔孟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他对道家思想的认同是有限度的，即便他讲归隐，也还是想以林泉为友而“抱经穷山”，研治

① 《方苞集》，第4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 《方苞集》，第4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③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71页，中华书局，1983年。

儒家经书，未曾想彻底遁世逍遥，这也是我们应当看到的。

从以上概略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方苞无论是在科考不第的日子还是在遭逢文字之祸的惊涛骇浪中，无论是在为官生涯中还是在退休之后垂老赋闲之日，方苞的思想都充满深深的矛盾和痛苦。方苞生活在“康乾盛世”，希望网罗更多汉族知识分子为大清帝国效劳。正是基于这种需要，方苞才有可能被康熙帝从监狱中起用提拔，使他由囚徒而变为皇帝近臣，但此前方苞由文字狱案所牵而被下狱论死，也正发生在“康乾盛世”，清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对汉族知识分子笼络而又钳制的政策都在方苞身上有直接体现。

吴敬梓

一、生平事迹

吴敬梓（1701～1754），安徽全椒人，字敏轩，号粒民，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工诗词散文，尤以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成就最高。又有《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诗说》等。

明清以降，全椒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文人辈出。而吴敬梓家族世代为地方世族，“家声科第从来美”^①，曾祖吴国用是顺治年间的探花，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岡皆榜眼及第，在明清时期，吴门是一门两鼎甲，三代六进士，这也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小说中说的“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取材来源。金和跋《儒林外史》说：“吴氏固全椒望族，明季以来，累叶科甲，望族子弟声气之盛，俨然王谢。”

^① 这是吴敬梓移居南京后，在雍正十二年（1734）除夕所作《乳燕飞》词中的一句。

吴敬梓 13 岁丧母，14 岁随父至赣榆任所。少时有文名，“先生生而颖异，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① 他的学习态度是认真刻苦的，头脑又聪颖，很快就打好了学识的功底，所谓：“用力于学，已有初基”，“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②，“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③ 从中可以看出，吴敬梓在青少年读书时代即曾在萧统《文选》上苦下功夫，为其日后在骈体文辞赋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④。吴湘皋为《儒林外史》作序说：

敏轩以名家子好学诗古文辞杂体以名于世。凡有所作，必曲折深入，横发截出，即于他人作，一览数行下，亦能以片语领作者意旨以中其要害。江南北朋友中，余独畏其才大、眼高、心细也。

吴敬梓自 14 岁随从父亲在江苏苏北赣榆县生活长达约十年，这个年龄段是人生中汲取知识，确定人生定位，基本形成世界观，以及初涉社会的最关键和最敏感时期。在学术界，对这段时期所知甚少，几近空白。在现有史料中，仅仅在《文木山房集》中见到吴敬梓少年时期收入的最早一首诗《观海潮》以及在《移家赋》中提到的有关他父亲在赣榆为官时的只言片语。有一次，他登上赣榆县城的高阁，参加县中名士的宴会，当众作了一首五律《观海》，使得满座皆惊，赞叹这个少年学子的诗思敏捷

^①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传》。

^②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传》。

^③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传》。

^④ 陈汝衡著：《吴敬梓传》，第 21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年。

和诗境雄阔。其诗曰：

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
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①。

他从高阁观海的壮景落笔，想象百川汇海、海市蜃楼的奇观，气势磅礴，想象飞腾，展示其意气风发、情辞慷慨的壮怀。这是他现存的最早一首诗，也是他第一次显露文才、钟情赣榆的实录。

他的父亲吴霖起为官清廉、正直，鞠躬尽瘁，在教育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为赣榆县做了很多贡献。到任之初，见到教舍凋零倒塌之状，先捐出自己一年的俸钱 40 两，继后又变卖祖产肥田三千亩，并变卖了在五河、天长、含山、和州等地的祖传当铺、布庄、银楼等，筹银近万两，修建因康熙七年（1668）在大地震中毁坏殆尽的文庙、尊经阁，并且新建了“敬一亭”。他亲眼目睹了其父的贡献，为他深感骄傲，然而同时目睹了其父因不善于巴结上司，终被罢官回乡的不公待遇，使他对官场的腐败有了切身的体会。

在父亲的直接监护下，吴敬梓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和培养，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学基础。吴敬梓 23 岁考取秀才，此年父吴霖起病故，但止于此，科举场上一直不顺遂。

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留下了二万多两白银的巨额遗产，可是吴敬梓“素不习治生，性富豪上”，“倾酒歌呼，穷日夜”，“生

① 吴敬轩：《文木山房集》卷二。

性豁达，急朋友之急”，族人之间有“夺产之变”，“兄弟参商，宗族诟谇”，视之为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

在雍正十一年（1733），与续弦叶氏迁来南京，移家金陵秦淮水亭，住在秦淮河畔的白板桥西，家境已困，从此吴敬梓在南京定居下来。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但他仍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仍好交友，“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

乾隆元年（1736），安徽巡抚赵国麟、江宁巡导唐时琳和学台郑江力荐他前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他因消渴加剧拒绝。晚年生活困顿，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度日，“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以至以书易米。每年一到冬天，气温苦寒，与朋友在晚上到城外绕行，歌吟啸呼，称之为“暖足”。密友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描述：“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

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到江苏扬州访友痛饮，微醉之中，反复朗诵唐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十月二十八日（12月11日），与自北京南下的王又曾在舟中痛饮销寒。归来之后，酒酣耳热，痰涌气促，救治不及，顷刻辞世，当时守在床边的只有幼子吴鳌。

二、文学成就

确立吴敬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

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 20 年时间，直到 49 岁时才完成。“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代指学术界等；外史即与“正史”相区别，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

吴敬梓看透了当时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里，他以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儒林外史》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世俗风气的败坏。如写周进、范进为考中举人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到胡子花白还没有考中秀才。尽管生活极为困顿，还是念念不忘科举考试。周进路过一处考场，进去观看，触动了一生的辛酸和痛苦，放声大哭，竟然难过得死去活来。后来在一些小商人的帮助下参加了考试，博得了考官的同情，才时来运转。当他考中举人时，以前讥讽挖苦他的那些人，都来奉承他，把他吹捧成最有学问的人。

又如范进，中举前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抱着一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卖。当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时，竟然喜极而狂，变成了疯子，幸亏岳父胡屠户打了他一巴掌，才使他恢复了清醒。这时候，当地的乡绅等有头脸的人物都对他刮目相看，有送房屋的，

有送财产的，范进的生活立刻发生了变化。

《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强烈的对比，对地主官绅阶层的虚伪贪婪进行尖辣的讥讽。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刻画出严贡生虚伪和欺诈无赖的本性。

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督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把范进表面严守封建礼法和实际的做作和虚伪刻画的淋漓尽致。

又如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

由于吴敬梓是从富裕官僚家庭出身，跌落到赤贫的生活状态，必然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下层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吴敬梓熟悉他们并同情他们的困苦。他看到当时社会存在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普遍现象，例如小市民和农民经历的是卖儿卖女的惨痛生活。有六个儿子的倪老爹，除掉死了一个外，其余五个中，卖掉了四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倪廷玺还要过继给鲍文卿抚养。

为义子，获得二十两银子^①。

还有小说人物庄尚志由朝廷“允令还山”，他在离京回南方时的路上到人家借宿，这家屋里本来住着老夫妻两人，当天早上老太婆去世，“没钱买棺材，现停在屋里。”因为只有一间屋，庄尚志勉强同老头睡在一张土炕上，想不到半夜后，老太婆竟然做起来，是“走了尸”，而同睡的老头不知怎的也断了气、放着两个尸体在面前，庄尚志是好善的人，就买了两口棺材把两个老人收殓了^②。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生活的普遍贫穷困苦。

《儒林外史》除了写乡村农民困苦外，对小市民的塑造照样留给我们鲜明的印象。吴敬梓在小说中写出了修理乐器的倪老爹、看坟的邹吉甫、开米店的卜老、开小蜡店的牛老等所谓低贱的小市民，他们一般是淳朴善良的、诚信厚道的。

《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专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可以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动的参考。也有盛赞《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①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

②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